

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 迷雾破除 奇幻落幕

□陈婷婷



石黑一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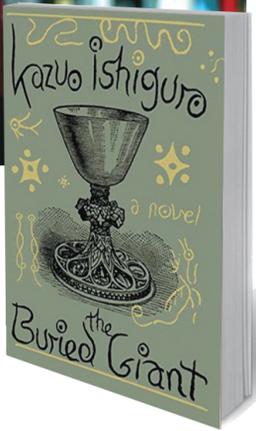
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作家三雄之一的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迄今已有6部小说问世。今年3月,阔别文坛10年的他携新作《被埋葬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回归众人的视野,再次引发文学批评界和读者的热议。小说甫一问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评论称“不同于石黑一雄过去的写作类型,却同样是典型的石黑一雄的故事”。小说的电影版权也已被制片人Scott Rudin买下。

《被埋葬的巨人》的场景设置在公元6世纪左右的英格兰平原,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交战连绵的烽火年代。故事始于一团笼罩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神秘迷雾,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虚构场域中,作家想要展现的主题也在迷雾中若隐若现。尽管披上了有如《魔戒》般奇幻的外衣,但新作并非是一部中世纪冒险文学,反而让人想起他的《别让我走》中的小说背景——不是近代英国、日本或是中国,而是一个悬浮在历史时空中的反乌托邦空间。10年前,石黑一雄借助以克隆人为代表的生物科技题材,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中生命伦理悖论的道德关怀。在《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再次彰显了作为“国际主义作家”的身份,题材的大胆创新正是为了打破纯文学上种种潜在的制约,让文本更加符合全球化的语境。石黑一雄认为:“我感到《文学类型》的边界正在崩溃,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于是在新作中,龙、食人魔、妖精等纷纷理所当然地登场。石黑的创造力在于,运用仿古的历险故事情节模式谱写出一个意境悠远的现代神话,一则“迷雾”中的现代寓言,娓娓的书写透露出强烈的时代质感。

《被埋葬的巨人》的求索主题以及“设谜—解谜”的情节符码类似于《浮世画家》《上海孤儿》《别让我走》,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主人公的身份追寻之旅皆有迹可循,依托的是自己可靠或不可靠的记忆。而《被埋葬的巨人》在承袭石黑一雄不断探讨的“记忆”母题的同时,出场人物却是一群丧失了记忆的人——来路不明的迷雾令所有人渐渐遗忘了自己的过往。亚瑟王的遗民们似乎安于和平的现状,几乎不谈论过去。某日,一对不列颠老夫艾索和碧翠思想去看望远方的儿子,也为了唤醒自己的记忆而踏上旅程。途中,他们遇见身负神秘任务的撒克逊战士和年迈的圆桌骑士高文。老夫夫妇知集体失忆症原来是由于一只母龙作乱。而在屠龙的过程中,众人意外发现了亚瑟王时代的秘密。最后所有人的记忆被寻回,却也意味着“被埋葬的巨人”即将被唤醒,它将揭开尘封的历史,掀起新一轮的血雨腥风。

此前石黑一雄的小说均以第一人称作,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孤独、压抑、自欺与不安,双重叙事策略起到了解构叙事者自我身份的奇特效果。而在新作中,作者努力想要跳出以个体经验来影射历史的写作框架。尽管这可能会使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相对弱化,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叙述的并置、多重空间共存的叙事不着痕迹地缓解了读者焦虑的推理,中世纪古老简洁的叙述语言营造出了陌生化的审美意蕴。不同于J.R.R.托尔金笔下那些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石黑一雄舒缓、质朴却又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书写策略令新作的阅读更富趣味和美感。

新书的创作源于对过去半个世纪中人类社会大事件的深度思考。东欧的种族冲突、卢旺达大屠杀、前南



《被埋葬的巨人》英文版

较之于精准地传递事实,他更倾向于追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书写,“创造一个更具隐喻性的文本,从而使读者可以将其对应到各种个人的以及政治性的场域。”《被埋葬的巨人》以奇幻手法、寓言性的疏离感为媒介,围绕历史、记忆与创伤,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困扰着当下文明社会的问题。石黑一雄在谈及新作主旨时说:“每段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总有黑暗、不为人知的记忆,在当时被刻意隐瞒或埋藏,但何时回忆、是不是该回忆,这是重点所在。”很明显石黑一雄并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被奇幻和隐喻所掩埋而变得晦涩,这一点在小说中反映得相当明显。例如,他安排了勇士屠龙的传统情节,却对理应精彩的屠龙过程一笔带过。

《被埋葬的巨人》分为四个部分,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不仅是揭示被埋葬的真相的漫长过程,也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叙事结构。故事以老夫夫妇寻找儿子为圆心,牵扯出了当年不列颠与撒克逊之战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主人公艾索也在旅途中,想起自己曾经的身份是亚瑟王麾下的骑士,因为无法接受亚瑟王破坏和平律法、大肆屠杀撒克逊人的作为而离开。由此,他所面临的困境也由私人关系扩大到了社会关系的层面,形成了“艾索—碧翠思”与“艾索—亚瑟王”之间的双重矛盾。

“艾索—碧翠思”之间的矛盾分歧在于,碧翠思认为自己与艾索之间毫无记忆沉淀的爱情缺乏根基,因此迫切需要寻回记忆,但艾索在乎的却是当下的感觉。他隐约意识到过往可能存在的黑暗,因而一再告诉妻子,无论想起来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要忘记这一刻对对方的感情。夫妻俩的感情线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当迷团随迷雾的消散而逐一解开时,艾索意味深长的话语点明了奇幻迷雾下文本真正想要表达的:“要不是迷雾夺去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爱会不会现在在这么坚定?或许是它让伤口得以复原的。”老夫夫妇之间的经验既是他们个人的,又是爱情具有普遍意义的表征。他们在恢复记忆之前曾遇到过一个船夫,船夫的职责是将人送到一个类似天堂、实际隐喻着死亡的岛上,但倘若一对夫妻要一同上岛,则必须证明他们彼此相爱。船夫是一个生命的拷问者,能够看穿无数对夫妻的实际生活——充斥着厌恶、愤怒、憎恨、单调,偶尔才得见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永恒之爱。这岂非古往今来男女关系的缩影?颇具深意的是,原本质疑彼此爱情的碧翠思,在记起夫妻间不愉快的过往之后,却领悟到“少了阴影,就是不完整的爱情”。因此,她毫无畏惧地独自上船,驶往彼岸,并坚信她与丈夫不会再分开。遗忘固然可以淡化痛苦,但在作者看来,惟有敢于弥合创伤记忆的爱情,才有可能获得超越生死的力量。

在前作《群山淡景》《长日留痕》和《浮世画家》之

联盟解体、弗雷布尼察大屠杀、“9·11事件”等“人类的耻辱”令石黑一雄对文明社会中的黑暗深感失望,同时让他意识到:“如果忘却历史,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去重蹈覆辙,但真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历史同样可以被操纵,用于激起群体的仇恨情绪。”石黑一雄本可以将故事背景置于卢旺达、科索沃或是南斯拉夫,但这些高度政治化的地域不符合他的创作意图。

中,主人公均以帝国抑郁症病人的身份登场。在战争年代,他们固守着内心过时的价值标准,基于盲目的信仰而参与到帝国的恶行之中;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无法面对不可逆转的文明创伤,选择了自欺欺人的暧昧反省。石黑一雄的高明之处正在于通过个人的经验来书写历史,但正如小说所反映的那样,社会往往沉浸在遗忘的狂欢中,对历史教训无动于衷。因此在《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不仅触及到了个体与记忆之间的张力,更由此引出了国家或社会团体的“选择性回忆”的幕后成因。小说中吞噬记忆的迷雾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也可以在人为操控下被消解,隐喻着集体记忆的动态建构性。

“艾索—亚瑟王”这一矛盾表现出的是对历史创伤是否该渗入集体记忆的对立态度。高文骑士强调,亚瑟王命人给巨龙施法,令它呼出的气息掩埋了人民的记忆,是为了让两族忘记仇恨,实现长久和平。但艾索却看出,亚瑟王是以欺瞒公众的手段来巩固政治认同的基石,从而维护其帝国的统治。亚瑟王死后,高文依然坚信不该让历史真相被公之于众:“一旦母龙不再吐气,全国人民将会记起些什么!我承认我们曾经杀人如麻,但我们让战争消失了……就让这个国家沉醉在遗忘中吧!”碧翠思也在担忧:“我们只顾着寻回自己宝贵的记忆,可谁知道又有多少陈年旧怨沉渣泛起?习俗和怀疑总是分裂我们两族。”这些表述不免令人感到石黑一雄的观点暧昧,有将一切历史均质化的嫌疑。在《浮世画家》中亦有类似的、带有洗脱罪责嫌疑的话语:“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然而从《浮世画家》的文本整体来看,石黑一雄借由主人公对自身过往和周遭人群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日本社会对二战的态度,折射出了日本国民在战争责任前的集体脱逃。《被埋葬的巨人》则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试图寻找恶与暴力形成的土壤,小说人物的话语道出了这种恶的相对性,善与恶之间的界限被小说中的迷雾所模糊——从结果来看,迷雾到底代表着善还是恶?

“艾索—亚瑟王”的矛盾聚焦于目的与手段之争,而年轻的撒克逊战士与年迈的高文骑士之间的冲突则隐喻时代的新旧更迭,其本质是政治话语的对立。撒克逊战士质问高文:“难道你认为靠屠杀和幻术建立的和平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在他看来,所谓文明有序的社会乃是建立在虚假记忆的基础上,所以他坚持屠龙,还原历史真相。艾索也犀利地指出缺乏历史反省的和平社会的不稳定性:“世上还有更多的撒克逊人,仇恨的循环不会被打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龙被杀死之后,撒克逊战士坦白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复仇,也是为将来征服此地做准备。所谓正视文明的创伤,其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石黑一雄采用了冷静的批判视角,深入当代世界格局演变进程中发生的种种暴力冲突的背后,诠释历史创伤、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小说标题“被埋葬的巨人”指的就是在个人体验和共同体的创伤经验中那些深埋于地下、远离公众视野的历史记忆。之所以将记忆喻为巨人,是因为当记忆浮出水面之时,将会对个体的身份建构以及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石黑一雄在接受B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非裔美国人的遭遇对美国来说就是‘被埋葬的巨人’,是一个社会倾向于集体失忆的例子。因为再次提出这一话题将催生出新的一代。”近期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或许再一次印证了他的担忧。小说人物立场的对立恰恰体现了石黑一雄对历史记忆的矛盾态度:是继承还是遗忘?创伤体验应当如何被书写?新作没有给予明确回答,无法回避的历史经验与创伤记忆牵引读者陷入伦理再难的境地中。面向未来的和平与发展,我们究竟该如何审视历史创伤、构建集体记忆?这或许是石黑一雄新作提出的最大悬念。



迷雾中的阿瓦隆(Avalon,亚瑟王传说中的重要岛屿,古老宗教的中心地)是亚瑟王所自来处、所终之所。但在很多版本的亚瑟王传说中,阿瓦隆只是个异质性的世界。美国女作家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的小说《阿瓦隆迷雾》三部曲展现的依然是在迷雾之后的阿瓦隆,并未改变亚瑟王传说的基本框架。然而在此框架之内,布拉德利却对故事进行了几乎彻底的翻转,通过巧妙的架构和叙述,展现了亚瑟王传说的另一种令人叹服的可能性。

小说与诸多亚瑟王传说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互文结构,这种互文性表现为一种迷人的异托邦结构。“异托邦”由福柯在1967年提出,与秩序井然的乌托邦相对,完全粉碎和混淆了空间的基本秩序。异托邦是开放结构,可能是对原有空间的增补,让空间处于多重并置的状态。在《阿瓦隆迷雾》中,布拉德利将亚瑟王传说的空间元素和人物都做了异托邦式的处理,让异质空间阿瓦隆和异质人物摩根和摩高丝等走到前台。

在基督教之前,阿瓦隆的女神曾经是大地的主宰,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阿瓦隆渐渐退隐到迷雾之后。以摩根为叙述人物,小说重现阿瓦隆及其消隐的历史,在《序章》中摩根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真实的故事。真理有许多样貌”,布拉德利也曾谈过她对亚瑟王传说的重写是为了反叛基督教的一元统治。布拉德利的反叛并非孤立存在,西方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精神解放运动——新时代运动就在突破基督教会的长期统治,出版于1983年的《阿瓦隆迷雾》正是随着这一运动应运而生。新时代运动又与凯尔特文化有关,不少学者提出,西方萨满的、神话的和精神的传统根植于凯尔特文化,凯尔特文化传统是与西方两希文明并提的一大文化传统。新时代运动的要义便是复活凯尔特的巫术传统与女神传统,而承载着德鲁伊教女神传统的阿瓦隆成为新异教主义和新时代运动的重要地点。

通过阿瓦隆之门,原本在亚瑟王传奇中被遮蔽的女性被重新书写。在亚瑟王的诸多传奇中,女性被塑造为“天使”和“妖妇”两类刻板形象,而《阿瓦隆迷雾》的女性形象多元而饱满,在阿瓦隆的传统中,女人傲岸和独立的品格备受称赞。从最早出场的伊格赖恩到死于葛狄文之手的妮妮安娜,都对女人并非男人所有物这一点倍加敏感。在阿瓦隆,女性的智慧和教育受到肯定,与基督教治下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对阿瓦隆女性而言,国家和政治亦可涉足。阿瓦隆女王薇薇安和塔利辛一起与男人商讨国事,在生命的鼎盛期,她甚至直接决定不列颠的主要事务。如果说阿瓦隆女王薇薇安和伊格赖恩是女神传统的代言人的话,那么摩根和摩高丝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质。全书以摩根为叙述者,一反以往对摩根的妖魔化叙述。在通行的亚瑟王传说中,摩根利用巫术满足自己的疯狂欲望,诱惑亚瑟生下葛狄文。这种妖魔化叙述与反女巫的传统一脉相承。而在《阿瓦隆迷雾》中,作者细致地呈现阿瓦隆女性的智慧及高超医术。被污名化的女巫,在历史上也确实曾被证实有在草药学方面作出过贡献。

和基督教的原罪情结相比,阿瓦隆的女神传统将人身体视为自然的潮汐。布拉德利丝丝入扣地展现了女性的欲望,与欲望的博弈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内容。出于对薇薇安两次安排婚姻的不满,伊格赖恩本想拒绝无瑟,但终究顺应被无瑟唤起的爱情,与无瑟走进婚姻并相爱一生。伊格赖恩的女儿摩根,始终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对兰斯洛特假道学式的犹疑嗤之以鼻。在摩根的观照下,兰斯洛特与王后妮妮安娜之间的柏拉图恋情便暴露出虚伪本质: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身体的结合,却永久独占对方的情感。

小说还透过摩高丝获取权力的苦心经营,深刻探讨了权力的话题。摩高丝的野心是接近王权,成为王后甚至共主之后。至高的地位对于摩高丝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母仪之威,她追求的乐趣是间接管理国家。在洛锡安国王洛特去世后,摩高丝表现出卓越的治国才能。作品在对古代传说的异托邦式书写中塑造了极具现代性的女性形象。

遗憾的是,大陆读者较早接触到的《阿瓦隆迷雾》恐怕是先于小说在大陆发行的迷你剧,影视作品未能够充分展现布拉德利思想的丰富性,人物形象也做了简化处理。迷你剧以伊格赖恩虔诚皈依基督教作为结局,片尾弥漫着一个时代结束的伤感又充满众神归一的暧昧喜悦。小说则以宿命论式的圆融笔调结束行文,布拉德利深思了阿瓦隆如何走进迷雾。消失的阿瓦隆令人叹息,却也并非非是悲哀,因为它只是作为异托邦隐入迷雾。无论小说结构亦或价值观念,均采用多元并置的方式处理,诸如男性与女性、基督教与德鲁伊教等。异托邦元素的存在让整部小说充满了流动与开放之美,在绵密的结构与细腻叙述中,小说自如流转于边缘与中心之间,布拉德利利用现代性彻底改写了亚瑟王传奇。

迷人的「异托邦」

□孙婷婷

《阿瓦隆迷雾》三部曲

动态

第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在上海颁奖

2015中译法文图书奖傅雷翻译出版奖日前首次在孕育翻译家傅雷的文化名城上海颁奖。由周小珊翻译、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点27分的朗读者》(让-保尔·迪迪耶·洛朗著)获得最佳文学译著奖项;由许明龙翻译、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出版的《请中国作证》(蓝莉著)获得最佳社科类译著奖项;最佳新人奖由《当代艺术之争》(马克·吉梅内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译者王名南获得。

2009年,为了在中国促进认识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推广法国文学,傅雷翻译出版奖创立,由法国驻华使馆组织评奖。该奖项每年奖励两部中译法文图书最优秀的作品:最佳文学译著一部、最佳社科译著一部(每部获奖译著的译者与出版人共享4000欧元奖金)。2013年起增设“新人奖”,旨在鼓励新生代的译者(获奖译者获得1500欧元的奖金)。

作家王安忆、艺术史学家朱青生受邀作为2015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特邀嘉宾出席颁奖礼。法国当代作家玛丽·尼米埃、菲利普·托赫冬也专程从法国远道而来,推介傅雷翻译出版奖。玛丽·尼米埃表示,没有译者的细致工作,图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这种旅行则不可能实现。她向译者的工作表达了敬意:“这些摆渡人,在世界的这边或那边,关注着这些相同的词句,要把意义与韵味传递到另一种语言。”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谈到:“翻译,即是相信普世价值的存在,而这是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价值之基础,也是一切创造的出发点,因为创造意味着交流。翻译,如圣-埃克絮佩里所说,是‘建立联系’。”

颁奖典礼之后,组委会还在上海举办了以“家庭、传递、灵感”、“中国的文学创作与阅读中是否存在哈法现象?”为题的讲座。(世文)

中国作家赴滑铁卢大学 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成立8年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多年来致力于中加文化交流,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摸索和交流。据孔子学院院长、作家李彦介绍说,为了进一步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孔子学院尝试了不同方式,启发培养海外大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包括与其他孔子学院合作,共同邀请国内的专家学者分批到北美巡回讲课,促进交流。

近期,孔子学院就邀请评论家何向阳做了题为《身体中的“灵魂”》的讲座。何向阳从女性的特殊视角切入,观察、分析、评论中国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何向阳着重介绍了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徐坤、魏微、潘向黎等女作家的创作情况和作

品特点,认为中国女作家群体正日益壮大,她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笔调,为读者讲故事,倾诉她们的心声和诉求。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副主编李东华,编辑部主任徐则臣以及英文期刊编辑总监Eric Edwin Abrahamsen组成的代表团也于近日到访滑铁卢大学,并向学校图书馆赠送全套英文期刊。施战军还介绍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文坛现阶段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作的努力和尝试。期间,代表团还与滑铁卢大学、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等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座谈,听取学者们对《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路灯》在加拿大传播的建议。(牛抗生 哈悦)



德国犹太裔夏洛特·萨洛蒙的油画作品

世界文坛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